

※※※※※※※※※※※※※※※※
 ※ 阜平文史资料 ※
 ※ 征求意见(活页)稿 ※
 ※※※※※※※※※※※※※※※※

政协阜平县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一九八七年十一月十二日

.....第二十三篇.....

杨耕田同志的光辉一生

“杨耕田同志是把他毕生的精力全部献给党和人民事业的，足为全党同志楷模……”这是杨耕田同志于一九五二年逝世以后，海一波同志在题词中对他光辉的一生所作的中肯评价。

(一)

杨耕田同志原名牛风林，排行第二，人们亲切地称他为“二牛”。他于一九一三年生于阜平县西庄村的一个雇农家庭，幼年依靠父母和哥哥卖苦力入学读书。一九二五年以优异成绩考入阜平县立第一高级小学。杨耕田同志在这里初步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开拓了思想和政治视野。他与进步同学结为密友，秘密阅读革命书刊，积极追求光明和进步。高小毕业后，抱着干一番事业的志向投考保定第二师范学校。第一场放榜，名列前茅，但因无钱交“门子”，未被

录取。落榜后因穷困而辍学，回家务农。

一九三〇年，十七岁的杨耕田同志被破格录用为初级小学教员，这就为他结交进步人士，研读马克思著作提供了时间和条件。教学之余，经常借故进县城，到简易师范同共产党员王宗良、李心仁、王德谦等人会晤，从他们那里借阅进步书刊，探讨革命理论，了解政治形势。他的思想很快升华到一个新的境界，形成了鲜明的政治观点，成为一个自觉的革命者。一九三二年经王德谦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杨耕田同志入党后，把大部分精力和热情倾注在革命事业上，他利用教师职业为掩护，秘密从事革命活动，积极在亲友中发展组织。同年秋末，他同王世煜等人在柳峪村建立党支部。一九三三年，阜平成立特别支部，柳峪党支部升格为区委，杨耕田同志任区委书记。

此时期，杨耕田同志领导了一系列反帝反封建斗争。一九三三年秋末，发动农民和学生砸了官办盐店。当时的食盐由官方指定的商人专卖。县城的食盐商张洛雨及其店掌柜为牟取高额利润，不仅缺斤少两，而且在食盐内拌土掺假，甚至将洗脸水也倒在盐槽内。受坑害的顾客十分不满，尤其是贫苦农民更是怨声沸腾，杨耕田同志决定在秋后农民腌菜的时刻打击盐商的不法行为。他到国民党县

党部（县党部领导权实为共产党所掌握）征得特支负责人王宗良等人的同意后即责成共产党员罗慎德、刘荣堂、王珩等人到各村秘密串连发动群众。同时，又通过“一高”党组织发动学生进行配合。到约定时间，农民依照计划从四面八方来到县城，学生则在头一天晚上将揭露盐商弊端的传单贴在了大街上，白天又同农民一起涌进盐店砸了盐秤和店铺门面，接着同盐商展开说理斗争。县当局被迫训斥了盐商的不法行为，并令其当众表示以后不再行骗，公平交易，此时期，杨耕田同志还领导了反^头割税、反斗行“撒格儿”斗争以及大规模的破除封建迷信活动。

一九三四年四月二十日，阜平党组织遭到破坏，杨耕田同志也在被捕的名单上。他得到消息后，临危不乱，镇定自若，在校内摆了个迷惑阵，即到与马驹石村隔河相对的柳峪村王世煜家中藏身。黄昏时分，国民党保定行营和河北省党部的特务人员来到马驹石小学，见屋内亮着灯，饭碗未刷，以为杨耕田吃过晚饭去解手，即在学校附近潜伏下来。但久等不见，才知上当。在马驹石没抓到杨耕田同志，又到柳峪村搜查，杨耕田同志则从王世煜的后门悄悄爬上山脱了身，后化装为脚夫在柏崖王中杰等人的掩护下出走绥远。但心中仍惦记着党的工作和同志们的安全，六月间又同王世勋一起回到阜平。进入县境，昼伏夜行，身上被荆棘刺破，脚上和腿上扎进许多毒针刺。当时的白色恐怖有增无减，国民党当局在全县推行保

甲制的同时，每天派特务人员抓捕共产党员，杨耕田同志冒着生命危险，在柳峪村主持召开了区委会议，会上分析了当前形势，对党的工作做出了二十四个字的决定：稳定人心、巩固组织、坚定信心、保存势力、提高警惕、等待时机。会后区委成员分头到各村做工作。已暴露的党员迅速转移，没有暴露的隐蔽下来，暂时停止活动。并要求外出的党员走到那里就把革命的火种撒到那里。

会后，杨耕田同志到岳父家隐蔽。敌人仍在四处抓捕他，在阜平难以存身，只得再次出走绥远，加入傅作义部。并改名为杨耕田。他在傅部积极开展我党工作，发展组织，并参加了著名的绥东抗战。

(二)

一九三七年“芦沟桥”事变以后，杨耕田同志听到八路军在阜平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权，忍痛将妻子儿女留在山西，只身回到阜平参加抗日斗争。回来后立即到县城找到组织，被分配到县农会工作。一九三八年一月，晋察冀边区军政民代表大会在阜平召开，民主选举产生晋察冀边区临时行政委员会。杨耕田同志被为阜平县代表出席了这次大会。会后，杨耕田同志负责筹备边区农民抗日救国会。经过紧张的工作，同年三月，边区“农救会”在阜平召开，杨耕田同志被选为农会主任，兼任中共党团书记。一九四三年，边区各群众团体联合组织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简称抗联会），他被选为边

区抗联会主任。

在此期间，杨耕田同志以他杰出的才能，领导了边区大规模的减租减息斗争。动员广大农民群众支持抗日战争和人民政权。为了保证减租减息的健康发展，减轻农民所承受的封建压迫，使其在生活上有所好转，他多次冒着生命危险穿越敌人的岗楼和封锁线，到各地视察工作，解决问题，指导运动。他每到一处，立即召集座谈会，或进行个别访问，了解群众的困难和苦处，倾听他们的意见和呼声。一九四〇年九月，他率领边区群众团体代表到唐县军城参加白求恩墓落成典礼仪式。在那里仅仅住了两个夜晚，还到军城附近的稻田村连续召开基层群众团体干部座谈会，除了听取工作汇报外，又重点了解减租减息工作。对存在的问题剖析了原因，做了重要指示，拨正了运动的方向。由于杨耕田同志工作深入细致，领导有方，边区的减租减息得以顺利发展和完成，使农民生活得到明显改善，发挥了抗日积极性。这对晋察冀边区的创建，巩固和发展，对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对坚持抗日战争直至取得最后胜利，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杨耕田同志出生于贫苦农民，经受过种种苦难，对劳动人民的疾苦深有体会。因此，他对贫苦农民有着深厚的思忆感情，和他们同呼吸，共命运，关心他们的生活，同他们保持着亲密联系。忠实地为广大贫苦农民谋取利益。一九三九年夏季，边区洪水泛滥，酿

成空前的大水灾。杨耕田同志亲自召集机关驻地的老农民，举行座谈，共同研究制定救灾措施，并以身作则，率先投入当地群众的生
产自救活动。

杨耕田同志的刻苦精神，优良作风，不仅影响着农会干部，而且在群众的思想中打下了深刻的烙印。尤其是在多次的对敌斗争和反“扫荡”斗争中，在极其危险困难的时刻，他周密的分析敌情，指出方向，鼓舞同志们的
情绪，勇往直前。

杨耕田同志从被压迫的农民中站立起来，在革命斗争中锻炼成为农民运动的优秀领导者和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一九四四年十月，他担任冀晋行署主任，参加中共冀晋区党委为委员。一九四七年十一月，调任中共北岳区
区党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继任书记，由群团改做党政工作。当时正值解放区开展暴风骤雨般的土地改革运动，他根据党的路线和政策，同一切妨碍群众发动的右倾思想作斗争，同时又时刻注意防止“左”倾盲目行为的发生和滋长。对于关系到党和人民利益的重大原则问题，他总是深思熟虑，兢兢业业，从不盲目行动，总是以极大的勇气坚持真理，坚持原则，但又不固
执己见。他时常深入下层，进行调查研究，掌握第一手材料，密切注视和把握运动的方向，克服偏差。他所到之处，就是农民群众发动最彻底的地方，也是贯彻党的政策最好的地方。

一九四九年一月，杨耕田同志调任中共察哈尔省委书记兼任省军区政治委员，同年九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召开第一届全体委员会会议，他以解放区农民代表的资格出席。进入张家口市以后，对各方面情况比较生疏，他就努力认识和了解新的工作对象，熟悉和了解新的工作环境，摸索和掌握新的工作方法。明确树立依靠工人阶级的思想，努力钻研工人运动中的问题，积极贯彻执行党中央关于依靠工人阶级管理好人民企业的指示。他除了批阅文件和出席会议以外，大部分时间都泡在工矿企业，搞调查研究。召开由不同人员参加的不同类型的座谈会，了解工矿企业的基本情况，解决工人最迫切的问题，制订恢复生产的计划和措施。在短期内，使破坏严重的工矿企业恢复了生产。同时，使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失业的工人逐步得到就业。

(三)

杨耕田同志，对党对人民忠心耿耿，无半点私心杂念。在他的思想意识中只有一种信念，那就是热爱革命事业，热爱伟大的祖国，并为她的繁荣昌盛竭尽劳瘁。在日常工作中，很少见他正点下班，总是早上班，晚下班，甚至通宵达旦地工作。他有一个良好的工作习惯，晚上睡觉之前，总要把当天的工作检查一遍，看看一天的工作是否做完。如果发现有的事情遗漏了，就彻夜把它做完，还另拟妥订出第二天的工作计划。有时已经睡下，忽然想起一件事情，立

即披上衣服下床，记在工作手册上。

由于长期辛劳工作，杨耕田同志患了斑替氏病，在得不到正常治疗的情况下一直抱病工作。他时常用暖水袋捂着肚子批阅材料和做报告。到一九五一年，病情已发展得十分严重。同志们劝他休养治疗，上级批准他休养，他才勉强到北京治病。但仍挂记着察省工作，时常给省委和省政府的同志写信，对各种工作提具体意见。“七一”、“八一”还亲自写了纪念文章。

病情刚刚有所好转，他在医院就住不下去了，要求恢复工作。回到机关后，即投入紧张的工作。当时医生规定每天只许他工作四个小时，但实际工作量却达到十多个小时，有时为了赶写大会报告或考虑重大问题，竟彻夜不眠。

省长张苏同志调动工作，杨耕田同志又兼任省长职务。省委副书记杨士杰到苏联学习，他身兼党政军要职，肩上的担子更重了。以带病之躯，用尽精力，领导了新区的土地改革，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和“三反”、“五反”，生产救灾……。

察哈尔省的农业产量历来很低，为了改变农业落后面貌，杨耕田同志于一九五二年春耕时节到雁北和察北的阳高、怀仁等地的农村进行调查研究工作，当时病情已日趋严重，但革命的热情和高度的乐观主义精神支持着他忍受病痛长途跋涉，走了好多村庄，视察

了农业先进单位，同劳动模范一起总结实现农业增产的先进经验。他解剖了不少农业落后单位，指出了产量低的原因和巨大潜力，对当地的工作给以极有价值的指示。他的调查极为深入，每到一处，对那里的土地、劳力、水利和肥料等问题都进行全面了解，还亲自察看积存在场边多年的烂谷秕子和树叶子，街道中的牲畜粪便和浮土，并掌握了精确数字。回到省委会，给华北局写了关于改革农业生产的报告。以大量事实指出了察哈尔省农业生产的巨大潜力，明确指出只要“解决了土地的加工，加水，加肥问题”，察哈尔省的农业产量就可以增加四、五成，给察哈尔省开展农业丰产运动指出了明确方向。杨耕田同志还视察了官厅水库和大同煤矿，深入到井下了解采煤工人的生产条件和安全措施。在此期间，杨耕田同志身体状况急剧恶化，饭吃不下去，觉也睡不好，每天晚上他用枕头抵着肚子在微弱的灯光下整理调查材料，第二天，仍然按照原来的日程安排进行下一步工作。

到一九五二年五月间，杨耕田同志的病已发展到危险期，实在不能坚持工作，不得不二次进住医院。但当时床位紧张，一时不能进住医院，他利用等床位的空隙又赶回察哈尔，在省各界人民代表会上做了关于“五反”问题的报告。由于治疗不及时和劳累过度，加速了病情的发展，经医务人员精心护理，不但不见疗效，反而日

益恶化，杨耕田终于卧床不起了，但他从不为自己的病情忧虑，而是时刻惦记着察省的工作，不断给省委写信，对抗美援朝、“五反”运动，爱国主义教育，加强党的领导，反对官僚主义，干部福利等问题，做了明确具体的指示，还筹建托儿所、保育院、干部子弟学校、干部疗养院和带孩子体弱的^对妇女干部的休假问题都提出了具体意见，同志们来看他，他喘息着问这问那，尽量避免谈自己的病。在他逝世之前，已经不能提笔了，就让妻子王春平代笔给省委写信做工作指示，几天后，便与世长辞了。

杨耕田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是奋斗不息的一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生。他的全部革命活动虽然仅有二十余年，但他的^卓著功勋和高风亮节却博得了原晋察冀边区和察哈尔人民的尊敬和^景戴，正如张苏同志的挽联所写的“出身农民领导农民坚持反帝反封建斗争二十余年危险艰难无虚日；生活朴素作风朴素全力为党为人民服务一片赤诚光辉灿烂照千秋”。

杨耕田同志离开人世已三十五个年头了，但他那坚强的革命信念，为祖国为人民的无限忠诚，和伟大的、无私的、忘我的自我牺牲精神，却永远光照人寰。他所遗留的功绩和典范永垂不朽！

赵 宪 赵有海

1987年6月